新闻热线：010—58884102
E—mail：zdd@stdaily.com
科技日報
■责编 翟冬冬
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点赞“考古梦”里的文化热情

玉渊杂谭

胡一峰

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以湖南省文科第4名的优异成绩选择了考古专业。一些网友表示惋惜，认为这个专业没有前途，钟同学却表示，她本人特别喜欢这个专业，以后还打算继续做考古研究。全国各地考古机构和考古人也纷纷出场“力挺”，为她送上祝福。读到这则新闻，笔者颇为感动。这个被网友戏称为“全国考古界宠起来的小女孩”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当下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对成功的定义已更加多元、人文情怀也更加深厚；把前途等同于“钱途”的观点正在失去市场。钟同学坚定的“考古梦”，让我们读到了一份强烈的文化热情。

应该说，这既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生动表现。毋庸讳言，有一段时间，考大学仅仅被看作跳出“农门”的手段，选专业则被简单地等同于选“饭碗”，文史哲以及各类基础学科因被认为不容易就业而门可罗雀、无人问津，有一些考生出于今后的生计考虑忍痛放弃自己的冷门爱好，少年志向化为虚空。其实，读大学既是谋生之阶，更是成才之路。选择专业，除了为今后的物质生活找一份保障，更应为人生的心灵旅程寻一片港湾。这一切固然有赖于个人的思考和抉择，也受到社会发展状况和进程的很大制约。

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认为，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人们会认识到，“人类的幸福并不是只能在持续增长的经济中找到”。当前，我国已经稳定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文化在社会宏观发展以及个体生活中的分量都变得更重。文学艺术、考古文博等领域成了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今天，对于不少人来说，听讲座、逛书店、看展览、品艺术变成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成了心心念念的打卡地。一股创造文化、传播文化和享受文化的热情，正在全社会兴起，并为文化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

特别是在免于物质匮乏的条件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即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等原因，各人生活水平有高低、家庭境况有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他们对文化艺术的兴趣更强，也更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心，遵从内心的召唤，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考古学、古文字学等以往被视为冷门的学科，成为越来越多高分考生的首选；哲学、博物馆学等看似“高冷”的专业，就业状况也都不错。这充分说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文化领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文化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日益明显。

在钟同学的“考古梦”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化的传承。钟同学自述，报考考古专业受到了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樊锦诗是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被称为“敦煌的女儿”，大半生奉献给敦煌这座文化宝库，为之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知道，文化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事业。只有一代代人薪火相传，文化才能永续发展并铸就一座座高峰。而一个时代偶像的变迁往往折射出价值观念的变化。樊锦诗等文化名家成为年轻一代追随和效仿的偶像，发挥着点燃理想的明灯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梦”勃兴，而这恰是中国文化复兴最牢固也最可期待的基础。因此，在为钟同学的“考古梦”点赞和祝福的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和学术必将因钟同学这样的新鲜血液的自觉加入而变得更加生机勃勃，迎来愈发灿烂的明天。

摄手作

归来

（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王俊民 摄

被马可·波罗带回西方的皇家冰酥

博览会

谈宜斌

冰淇淋已经成为夏天必不可少的消暑佳品，大多数冰淇淋是以牛羊奶或奶油等乳制品为基本原料，择水、糖、果汁等，经混合后一边制冷一边搅拌使其凝结成半固体而成，口味品种多样。

据业内人士介绍，好的冰淇淋感观色泽应均匀一致，形态完整，细腻光滑，颜色柔和自然；吃到嘴里凉而不冰，有纯正的乳香味和水果的特有风味，奶油味浓但不甜腻。

冰淇淋其实是在冰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历史记载，北宋英宗年间（1064—1067年）有一种专供皇亲贵族的冷食叫冰酥，又称冰酪，它是以冬天藏在冰窖里的冰块，与牛羊奶、果汁等掺和在一起调制而成的。宋人杨万里对冰酥情有独钟，写诗云：“似腻还成爽，如凝又似飘。玉来盘底碎，雪向日冰销。”诗意是说，冰酥看上去是腻口的，入口却爽滑好吃；看上去是凝固的，入口却软绵飘逸。刚取出来时晶莹似玉，放到盘子里就碎了，不一会好像雪见到太阳一样，渐渐消融了。

元世祖忽必烈最喜欢吃冰酥，将其列为宫廷消暑冷食，经御膳房多次改进，使之味道更佳。日本的《日新治疗》曾记载，为了保护冰酥的制作秘密，这位皇帝还颁布了一道除王室外禁止制作冰酥的敕令。元朝初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款待，当他吃到冰酥这种清凉味美的冷食时，觉得世界上只有中国有，于是想尽办法让忽必烈特许他去冰酥制造作坊参观访问，从而暗地里学会了制作冰酥的技术。1295年，马可·波罗将此技术带回到意大利，还在他的《东方见闻录》中写道：“东方的黄金国里，居民们喜欢吃奶冰。”自此，中国冰酥便在意大利传播开来。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国王为了与强邻法国结盟，挑选一位漂亮的公主嫁给法国王室。这位公主担心适应不了法国的饮食习惯，便将一名厨师也带到了法国。陪嫁的厨师在法国将意大利宫廷里制作冰酥的方法传给了当地人。后来，随着法国王室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一世，冰酥的制作技术又传到了英国。这样，冰酥经过辗转传播和对配方及其制作方法的改进，被英国人定名为冰淇淋并在1769年收入《牛津大辞典》内。1777年，冰淇淋作为一种软饮料，在美国各地报刊广泛刊登广告，继而在欧美逐渐大普及。特别是美国人南希·约翰逊于1846年发明了手摇曲柄冰淇淋冷却器以来，人们便可在家里自制冰淇淋了。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还原历史需兼顾史实与史识

——读黄西蒙著《历史的风景：重返历史上28个关键瞬间》

字里行间

解玺璋

热了很久的民间写史，用力最勤最多的，大约是在“恢复历史真相”这一点上。作者和读者都很在意能否重返历史现场，其目的无非是想看一看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纠正那些一直占据我们头脑的谬说和臆断。

历史被歪曲、改写、遮蔽、误解的原因很多，非只一端。当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怀疑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真实可靠性，指责梁启超造假，只因他看到的材料尚不足以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直到孔祥吉先生发现当年刑部司员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才解决这个问题，还梁启超以清白。这是历史论述中很常见的现象，说明新的材料的发掘、发现，常常可以改写历史的面貌和结论。

此事常有，无须多言。此外，还有一点也需说明的是，有时候，材料是同样的材料，但由于观点和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历史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写作，写作者作为历史的认识主体，自有其不可离弃的价值观，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写作者脱离这一点去侈谈所谓客观真实性。同时，基于对价值多元的尊重，我们也没有理由排斥不同观念指导下的对于历史的解读。

以上这些思绪，是我读黄西蒙的历史文化随笔集《历史的风景：重返历史上28个关键瞬间》时想到的。全书28篇，分属三个部分编排，首帝王，次将相文人，再次为小人物、无名氏，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

不过，黄西蒙历史书写更突出的特点，是见小不见大，即小中见大，这个“大”也不是宏大叙事之“大”，而是“奇特细节”，他更关切的是历史跌宕里个人的体验。在历史大变局即将到来的时刻，“历史中间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也许有少数先知先觉的人敏锐地发现了某些端倪，却也无力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改变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动因常常又蕴含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偶然性中。我很认同黄西蒙的这种看法，它的好处是把历史研究和书写引向人，而不是仅仅面对一堆空洞的概念。罗素认为，历史是人的创造，研究历史也就是研究人性，研究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读黄西蒙的书，可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读黄西蒙的这部作品，感觉他是很想出新的，几乎每一篇都想纠正旧说，提出新的观点。这里可以感受到一个青年写作者的锋芒和锐气。能看出来，作者读书颇多，可谓杂学旁搜，古今并蓄，虽没有秘府典籍，官私收藏，但掌握的材料还是很丰富的，有些也是稀见的。因而，他立论的基础是很扎实的，绝非泛泛空谈，耽于想象和推论，也就避免了历史写作中常见的偏重材料或偏重观点的毛病。

我和黄西蒙都供职于报社，并有在报社写评论的经历。方汉奇先生曾对我说，有新闻工作经历的人，搞历史研究有便利条件。我想他的意思是说，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能教会我们用事实说话。这里包括了两个方面：事实和说话，移植到历史研究中，或许就相当于史实与史识吧。利用得好，这便是我们的优势。黄西蒙的历史写作，即得益于此。

（作者系知名文化批评家）

挟裹一身清凌凌

物种笔记

梁永刚

夏日的菜蔬家族中，如碧玉般青翠的黄瓜，是一位婉约温润的清秀女子，仿佛刚从诗经中走出来，挟裹着一身清凌凌、绿蒙蒙的青气。黄瓜口味清凉、脆甜汁多、生津止渴，是老少皆宜的消暑佳品。酷暑盛夏大热天，庄稼人从田间归来，又饥又渴，伸手从藤上摘下一根黄瓜，用手上下一拨拉，填到嘴里咬上一口，大嚼一气，没等一根黄瓜下肚，饿意立减，暑热顿消。

黄瓜嫩时呈青绿色，顶着黄花，遍生短刺，至老则变为黄色，故名黄瓜，也叫刺瓜。黄瓜是地道的舶来品，原产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北部地区，于3000年前开始栽培，随着各民族的迁移和往来，黄瓜由原产地向东传播到中国南部、东南至各国及日本等地；向西经亚洲西南部进入南欧及北非各地，后又传至欧洲各地及美洲。由于广泛栽培，历史悠久，黄瓜的品种很多：有果大、圆筒形、皮色浅的南亚型；果实较小，熟果黄褐有网纹的华南型；嫩果棍棒状，熟果黄白色无网纹的华北型；果实中等、圆筒形，熟果浅黄色至黄褐色的欧美型等。而每一种类型的黄瓜中，又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品种，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在我国古代，黄瓜还有一个名字叫胡瓜，据说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得种故名。”又据唐《拾遗记》记载：“大业四年，避讳改为黄瓜，俗又称王瓜，有春、秋二种。”后赵皇帝石勒是羯族人的后裔，由于自己是胡人，故而反对把北方少数民族叫胡人，为了避讳，将胡瓜改称黄瓜。传说石勒有一次大宴群臣，餐桌上摆着一条条翠玉般的胡瓜。席间石勒故意问郡守汉官樊坦，桌上何物？樊坦知道石勒是在考问他，于是毕恭毕敬地答道：“此乃紫案佳肴，银杯绿菜金樽甘露，玉盘黄瓜也。”这个故事只是传说，是真是假难以考证。

乡谚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一把细微弱小的黄瓜种子，清明落入泥土，立夏茁壮成长，小满枝叶茂盛，芒种崭露头角，小暑走向成熟，从种到收，始于希望，结于丰盈，走过了一个个节气的生命驿站，占尽了春夏时节的美好时光。乡人种黄瓜，多是见缝插针，巴掌大的空地，搭上几个黄瓜架，自家吃，也让四邻摘。黄瓜搭架，往往和番茄比邻，像一对好兄弟，谁也离不开谁。乡间民风淳朴，村人荷锄而归，口干舌燥，嗓子眼直冒烟，路过谁家的黄瓜架，顺手摘一根黄瓜吃，是算不上偷的。若是哪家门前屋后空地多，人也勤快，小菜园种下的黄瓜多，自家又吃不完，一大早摘上一篓，挑着挑子，推着车子，游乡叫卖，换俩零花钱，补贴家用。

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古代的“硬核”环保措施

付 雷

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国君鲁宣公，他手下有一个大臣叫里革。夏天正值鱼类繁殖的时候，鲁宣公却到水潭里下网捕鱼。里革看到以后，割破了鲁宣公的渔网，并且给他讲道理，鱼类繁殖的时候，不能补小鱼，砍伐树木的时候，也不能砍新枝，这都是为了万物繁衍不息。专门掌管渔猎的官员，平时也是这么要求国人的，您也应该这样。鲁宣公听了以后感慨道，我犯了错，还有人纠正我，真是太好了，这本身也是一张网啊！这便是“断罟匡君”的故事，“罟”是渔网的意思，“匡”是纠正的意思。

里革对鲁宣公的规劝，蕴含着生态环境保护的大道理。在中国古代，人们对环境保护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且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环境。

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指出，必须要保护好山林，才能保证衣食之源。孟子也说“斧金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也就是说一定要根据季节的变化和树木的生长规律来砍伐树木。唐代韩愈认为，人们开垦田地、兴修水利等生产活动，破坏了自然环境，应该节制生育，减少对自然的破坏。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历代统治者从机构和官员设置、法律制度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据记载，殷商时期的法律规定不准人们把垃圾随便倒在街道上，如果被抓住了就要砍断丢弃垃圾者的手。周朝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其中有不少官员是跟环境保护相关的，比如掌管山林的官员叫做山虞，要求民众在规定的时间砍伐树木，冬天砍伐山南侧的树木，夏天再砍伐山北侧的树木。掌管田猎场的官员叫迹人，不让民众猎取幼兽和鸟卵。秦朝的统治者比较重视植树造林，大将军蒙恬就曾经在北方边塞种植大批榆树，形成一条“绿色长城”。汉朝时期的地方官员为了保护水资源，专门颁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宣武帝还把禁止屠杀怀孕的母兽确立为永久的制度。

历朝历代都有地方官员向朝廷进贡珍稀动植物的传统，唐朝皇帝则下令禁止这类行为，已经捕获的珍禽异兽也要放归山林。唐朝的城市已经颇具规模，人口众多，生活垃圾也相当可观。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以清理垃圾和粪便为职业的人，官府对于那些随意倾倒垃圾的人，处以刑罚，都城长安也已经修了排水沟，这些措施都极大改善了城市环境。北宋时期为了维护京城街道卫生，还设置了街道司。

宋代专门设有农师这一官职，指导并检查民众植树，对于那些种树多的民众还会给以奖励。明清两朝不但沿袭了前朝历代保护山林、植树造林的传统，而且也都继续加强了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

除了在机构和官员设置、法律制度等方面做的尝试，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动物园、植物园、自然保护区的场所。

历代的皇帝和封王都喜欢划很大一片山林设立苑囿，不但可以作为自己田猎和悠闲的场所，而且也可以收藏和保护各类稀有的动植物。比如秦汉时期的上林苑，不但移植栽培了海内外的奇花异木，而且豢养了大量珍禽异兽。上林苑中建有多个离宫别馆，如扶荔宫、葡萄宫等，其中的扶荔宫就栽培了来自南方的各种植物，并以栽培荔枝而得名。上林苑也有专门的场所饲养大象、白鹿、虎、豹等动物。

明朝皇帝建了多处饲养珍稀动物的场所，比如湖城、豹房、百兽房、百鸟房、鹰犬房等。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曾经从域外引进大量动物，如长颈鹿、鸵鸟、骆驼、狮子、马来貘等，这些动物就被养在皇家动物园里。

清朝末年建立的万牲园，是最早面向公众开放的动物园。这家建立于1906年的动物园，两年后正式向公众开放，其中饲养了狮、虎、象、猩猩、斑马、鹦鹉等动物，其中很多动物都是从外国买来的。有意思的是，万牲园刚开放的时候，对于男女游客是分别开放的，有几天只供男性游客参观，另外几天只供女性游客参观，直到民国以后这一规矩才被废除。这里也曾被作为农事试验场，民国后还曾经在此建立北平研究院，下设动物、植物、生物三所，开展科学研究。这个万牲园也就是今天北京动物园的前身。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